

國學

第一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GUO XUE

國學

第一集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國學·第一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省人民政府
文史研究館主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20-09398-2

I. ①國… II. ①四…②四… III. ①國學—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310981 號

GUOXUE

國 學 (第一集)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主辦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	謝 雪
封面設計	張迪茗
技術設計	戴雨虹
責任校對	藍 海
責任印製	李 劍 孔凌凌
出版發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樹街 2 號)
網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發行部業務電話	(028) 86259457 86259453
防盜版舉報電話	(028) 86259457
照 排	四川勝翔數碼印務設計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插 頁	4
印 張	36.75
字 數	6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數	1000 冊
書 號	ISBN 978-7-220-09398-2
定 價	76.00 圓

■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電話：(028) 86259453

《國學》集刊編輯委員會

顧 問

蔡 競 李後強 侯水平 何天谷

主 任

向寶雲

委 員（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 川 艾 蓮 向 熹 向寶雲

李後卿 張 彥 陳世松 陳德述

曾紹敏 舒大剛 彭東煥 蒙 默

謝桃坊 潘殊閑 譚 平 譚繼和

主 編 向寶雲

審 定 謝桃坊

編輯部主任 彭東煥

國學應時雄鉤沉化作龍
傳承當枕上蒙養寫心胸

國學集刊在川創世誌禧
甲午冬月蔡競於澄懷堂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文史研究館黨組書記蔡競 題

繼承國學傳統
弘揚中華文化
甲午仲冬李後強

果為國粹
國必長存

甲午冬月 侯水平

重證本是
探索真知

甲午之冬
何天谷



發 刊 詞

中國近世國學運動的興起是以1905年上海國學會刊行《國粹學報》為標誌的。民國元年（1912）元月四川省政府為“研究國學，發揚國粹”，特設立國學院並創辦《四川國學雜誌》，1922年時任四川通志局總纂宋育仁創辦《國學月刊》。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心轉移西南，國學運動的中心亦相應向西南轉移，促使四川的國學研究向新文化傾向發展。1940年華西協合大學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國學研究性質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同年在成都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創辦《國學季刊》和《貴善半月刊》；1941年由國民政府支持顧頤剛在重慶主編國學研究性質的《文史雜誌》，同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四川南溪李莊繼續出版國學研究性質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6年四川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學生組建國學研究會，出版《國學會刊》。從上可見四川雖僻處西南，卻得國學運動思潮的風氣之先。1993年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創辦大型學術集刊《國學研究》預示國學熱潮再度在我國興起，適應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偉大號召。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與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為承傳和發揚四川國學研究的光輝的學術傳統，開創國學研究的新局面，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特籌辦大型學術集刊——《國學》。

國學是近世新興的一門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綜合性學科。我們從對國學運動歷史的考察，可見到它並非是如國粹派學者所理解的

以儒學價值為核心的學問。王國維和劉師培以它為中國學術，胡適以為是對中國過去一切文化的研究，這皆過於空泛，勢必分解入其他的學科；顧頡剛以為是對中國史料的研究，則取徑十分狹隘。蜀中學者劉咸炘曾指出國學是四部書（經史子集）相連，不可劃疆而治，它與科學不同。葉楚傖在重慶時曾認為文史研究——國學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存在的文史批評公案。郭沫若早年將國學研究等同於考據，並提倡科學的考據。國學前輩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國學的性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我們認為，國學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問題和中國文獻與歷史存在的狹小的學術問題。胡適關於《紅樓夢》版本及曹氏家族的考證，這不是文學研究的範圍，亦非文學研究方法可以解決的。梁啟超關於《老子》的作者和成書時代的懷疑所引起的討論，這不是哲學研究的範圍，亦非哲學研究方法可以解決的。顧頡剛關於上古史的懷疑而引發對“三皇”、“五帝”的考證，這不是史學研究的範圍，亦非史學方法可以解決的。這些皆是國學研究去解決的狹小的學術問題。此外，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的許多重大的學術問題和文史批評的公案，例如中國上古史的斷代，中華民族的起源，儒家學說與中國政治的關係，天人合一說的本義與演變，陰陽五行學說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漢民族國家政權的民族政策，中國詩學與儒學的關係，中國絲綢之路的開通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國南海疆域的形成，儒家是否屬於宗教，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新發現的古代竹簡與帛書的系統考釋，西夏文書的考釋，新儒學的學術特徵，等等；這些皆是複雜而困難的學術問題，亦有待國學研究去解決。

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是指導我們從事國學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可以引領我們以科學的方法去尋求真知，在研究工作中沿着合理的方向前進。科學方法是在近代實證主義哲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或稱實證方法。自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在整理國故、研究國學時即提倡采用新的科學方法，他們還認為中國乾嘉時代的考據學方法的實證精神是與科學方法相通的。我

們主張繼承國學運動新傾向學者們使用的科學方法，使之隨着現代科學的進步而愈益完善，如傅斯年所期望的，達到“繁豐細密”的學術境地。國學運動新傾向的學者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是採取“疑古”的態度，國粹派學者則採取“信古”的態度，近年學術界更傾向於“釋古”的態度。我們既不堅持“疑古”，亦不盲從“信古”，更不贊成缺乏獨立研究而僅凭他人成果遂去“釋古”。我們提倡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科學的方法和尋求真知的客觀態度去對待中國傳統文化。

我們不贊成國粹主義者從經世致用的願望出發，試圖以儒家政治道德觀念去發掘傳統文化的價值而期望改變世道民風。國學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一種重要學問，它是整個中國學術的一個部分，在中國學術中有其合理的地位。我們沒有必要誇大它在中國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化中的作用和意義。國學的作用和意義是有限的，只能是少數學者的專業工作。傅斯年以為這種研究由少數學者辛勤地工作，在很小的範圍內可以表明國家對學術的崇尚。自近年國學熱潮再度興起，某些學者有意擴大國學的作用和意義，大力宣揚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傳統倫理道德，主張廣泛學習國學，還提倡讀經。這遠離了國學的性質，重蹈國粹派的故轍，將國學基礎知識與國學研究混為一談，根本不屬於國學研究。中國應有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念。國粹主義者所弘揚的國粹大都實為國渣，走上了文化保守主義的道路。我們同意郭沫若的意見，他說：“我是以一個史學家的立場來闡明各家學說的真相。我並不是以一個宣教師的態度企圖傳播信仰的教條。在現代要恢復古代的東西，無論所恢復的是那一家，事實上都是時代的錯誤……古代的學說也並不是全無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已融會在現代的進步思想方面了。”這也應是國學研究者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因有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文獻而感到自豪；其中有許多傳統文化的學術問題和文獻與歷史存在的狹小的學術問題，這需要由國學研究者進行艱苦的探討。國學研究是純學術性質，不具有功利性和實用性，其意義在於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中，尋求真知，

掃除謬妄和迷信，為其他學科提供理論的和事實的依據，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是國家和民族的學術命脈。我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立文化強國，在此過程中國學有其獨特的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學運動新傾向的學者們曾希望漢學、中國學或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這個宏偉的願望是不易實現的，它的實現即在於國學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這將從一個方面標誌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我們創辦《國學》集刊是為團結有志於國學研究的師友們，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目 錄

先秦儒家學說與黃老之術的比較研究	歐陽禎人 (001)
儒家經典與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建構	
——以《禮記》《尚書》《論語》為例	譚 平 (013)
儒學別裁緒論	曾棗莊 (027)
新儒學家發現的儒家之道及其意義	謝桃坊 (047)
論《尚書·虞夏書》及“偽古文尚書”冤案	朱小豐 (063)
三家《詩》研究在元明及清初的發展軌跡	馬 昕 (085)
成都文翁石室叢考	舒大剛 任利榮 (120)
《十三經恒解》——清代儒學轉型時期新心學的標誌性文獻	譚繼和 (143)
解析宋育仁的“復古改制”思想	曾紹敏 (159)
清末民初新學與舊學的嬗變及整合	
——以錢玄同的思想變遷為例	曾 平 (169)
試論白敦仁的宋詩研究	張承鳳 (190)
《國語》周宣王“料民”問題考辨	王 燦 (200)
漢“五諫說”考論	鍾思遠 (214)
王褒生平及作品考	李 昊 (224)
《肥致碑》為真漢碑考	何 靖 (234)
關於謝靈運年譜中的幾個問題	宋 紅 (242)
《宋書》良吏考	王懷成 (259)

關於《錦帶書十二月啟》的考辨	彭婷婷 (281)
北宋釋契嵩詩文編年繫地考	譚新紅 馮紅梅 (291)
呂惠卿詩文繫年考	湯 君 (309)
《碧雞漫志》劄記續補	彭東煥 王映珏 (325)
朱熹創設綱目體的立意及背景	曹鵬程 (349)
黑水城文獻《六十四卦圖歌》的性質與占卜體例考	李 偉 (358)
陳子龍與柳如是情事考辨	權惠娟 (372)
馮琦著述考略	張秉國 (393)
金聖歎事跡編年訂補	陸 林 (403)
《函海》編修與版刻考論	王永波 (429)
李調元《蠡翁詞》編年考	魏紅翎 (446)
王叔岷先生著述考	胡開全 (455)
王叔岷《左傳考校》的學術價值	陳玉蘭 (468)
潼南大佛寺造像銘文考釋	劉長東 (481)
浙南馬燈舞及其作為文化表象的意義	王 皓 王小盾 (506)
試論納西族始祖神話中的族群關係及神話之結構與轉化	文若暄 (523)
袁珂學述	賈雯鶴 (550)
回憶父親龍晦	龍達瑞 (566)

先秦儒家學說與黃老之術 的比較研究

爲什麼在戰國中晚期的先秦儒家文獻^①中會摻雜一些黃老的思想？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是個別思想家的選擇，還是時代的潮流？如果它不是偶然的個案，而是必然的走向，那麼，思想史上的這種流變態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既然先秦儒學是孔子及其後學的偉大創造而成爲當時舉世矚目的顯學，那麼，黃老之術爲什麼會在漢初的政治舞臺上取儒家學說而代之？站在先秦整個的學術背景之中對二者的內涵進行一番比較，從而探究先秦儒家學說的本質實在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學術問題。

一、黃老學說崛起的原因

韓非子云：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

^① 如《上博簡》第二冊、第五冊。

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韓非子·顯學》）

矛頭直接對準先秦儒家：“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話說得有點刻薄，但是未必就不準確。對此一尖銳的批評，筆者下文有進一步的分析，現在要說的是，韓非子的這段話對我們理解先秦儒家學說在孔子之後的發展是有啟發的。筆者的意思是，之所以“儒分爲八”，有兩個實質性的因素：其一，孔子一生勤奮好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因此思想的內涵極其豐富，溫良恭儉讓，沒有門派作風，平實、厚道，不作驚人之語，沒有黨同伐異、先入爲主的偏見，沒有在思想上刻意地打造理論體系的企圖。這是在孔子去世之後，其學生俱道孔子，而各取所需、取捨不同的重要原因；其二，孔子思想的精華是“爲政以德”（《論語·爲政》）、“仁之以德”（《上博簡·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第二簡），對國家的領導者，特別是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領導者來講，確實是高不可及的德性修養要求，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之中很難實現。它的最大的價值在於對現實各個諸侯國對外攻城以戰、對內草菅人命之政治的批評。當孔子的學生們走向社會，面對各種各樣的現實生活的時候，他們就不可能守株待兔地抱住孔子曲高和寡的理念坐以待斃。因此，進一步修正、豐富、發展原始儒家的理念就在所難免。筆者以爲，這是“儒分爲八”的最重要原因。孔子的高足子貢就研究過，至少接觸過黃老道家哲學，子張氏之儒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過黃老之術的成分^①，潛伏在《上博簡》第二冊、第五冊文獻中時隱時現的黃老思想，也就是孔子的後學們爲了突破儒家的困境所作的一些努力。

不論是從傳世文獻還是從新近出土的先秦儒家簡帛文獻中，我們都發現，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後，確實出現了一個極其劇烈的、與其他各家各派交流互動、彼此對話甚至彼此詰難的局面。學術的交流無非兩種基本的形式：一種是彼此學

^①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尸子》）關於子張氏之儒吸收黃老之術的考證筆者另有專論（《論子張氏之儒與孔子的思想差異》），其材料主要見於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第二冊中的《從政》甲、乙篇。

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各種特殊的形式涵化異己的思想，如郭店儒簡與上博簡中的一些文獻，就是這種理論形式的嘗試；另一種交流的形式，則是彼此批判，彼此否定，千方百計在主觀上要做到你中無我，我中無你，但是，卻又無形之中藉用了異己的思想武器，重新調整、豐富自己的戰鬥力量，孟子、荀子的理論鬥爭形式基本上就屬於這種。

可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諸子百家，各種資源都有，為什麼黃老道家的思想在《上博簡》中有如此強烈的穿透力呢？為什麼偏偏是黃老之術異軍突起，在漢代初年躍居百家之首而居於統治的地位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究的問題。太史公云：“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種評價顯然是站在黃老道家的角度，對先秦時期追求純德性精神境界的儒家哲學的批評。太史公為什麼對儒家哲學有這樣的評價呢？我們看一看下面的這段話就很清楚了：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原來太史公完全是站在社會現實的立場上，站在“人主”角度，對儒家與黃老道家進行了比較。他認為先秦儒家的致命弱點是孔子提出了“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的理念，把“人主”設定為“天下之儀表”，“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人主”不僅要有高深的道德修養，而且要以身作則，在治理國家的各種行政事務中做出表率，像上博藏竹書《容成氏》中的大禹一樣，太累，太划不來。由此我們一下子就明白了，漢代初年黃老哲學盛行於朝野的真正原因，並不僅僅在於黃老哲學“清靜無為”^①，而是在於像劉邦這樣的實用主義者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接受儒家的政治哲學

① 劉澤華、葛荃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訂本），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頁。